

外国历史小丛书

傅立叶



K835.657/6

外国历史小丛书

傅立叶

高 崧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55820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0年·北京

755820

目 录

一	苹果的故事	1
二	一个平凡的店员	2
三	时势造英雄	10
四	“引力”	17
五	空想家、讽刺家	22
六	政治上的庸人	36
七	退出历史舞台	39

一 苹果的故事

我们熟知的关于苹果的故事有三则。

一是：《圣经》创世记里叙述的夏娃和亚当偷吃苹果的故事。夏娃受了蛇的诱惑，偷吃了伊甸园的苹果，亚当又受了夏娃的怂恿，也偷尝了苹果的滋味。这件事被神耶和華察觉了，判定夏娃和亚当犯了罪。原来人吃了这种果子，就能和神一样眼睛明亮，区分善恶。神生气了，就处罚亚当和夏娃在人间受折磨。

二是：古希腊神话里关于巴里斯的苹果。有三位女神争执一只写有“给最美丽的女神”的金苹果，她们相持不下，请巴里斯来裁定。有一位爱情女神许诺把美女海伦酬谢他做妻子，巴里斯就把苹果判给了她。原来海伦自己有丈夫，两位没有得到苹果的女神帮助海伦的丈夫向巴里斯夺回海伦，于是引起了一场战争（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特洛伊战争）。

三是：科学家牛顿的苹果的故事。据说，牛顿是从树上落下苹果这个现象得到启发，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。

据本书主人公傅立叶自述，他自己也有一则关于苹果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公元 1798 年或 1799 年，傅立叶从法国外省来到首都巴黎，在一家叫费佛里叶（法文译音，二月的意思）的餐厅进餐，餐费里有一只苹果算了他十四苏钱。傅立叶很诧异，在外省，一只同样大小、同样质地的苹果，只要半个里阿尔就可以买到了，一个苏值四个里阿尔，十四苏在外省可以买一百一十二只苹果。首都和外省的地区差价竟是如此悬殊！傅立叶开始怀疑这个社会制度，并从此着手探索。据傅立叶自述，这只苹果使他“发现”了一种“引力”，这个引力比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更为“重要”。

“历史上可以数出四只苹果，前两只苹果以产生不幸著称，而另外两只苹果则因为丰富了科学而闻名。”这也是傅立叶自己的评价。

傅立叶究竟“发现”了什么“引力”？这个“引力”如何重要？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话得从头说起。

二 一个平凡的店员

傅立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大思想家，空想

社会主义者。在他的“发现”没有被社会注视以前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凡店员。但是，经商多年的店员经历，正是他从最普通的、最常见的商品交换中获得了“发现”的基础。傅立叶自述的苹果的故事，是完全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，这不仅因为傅立叶的品格使我们不必怀疑它，而且因为对于一个老练的店员来说，对某种商品的地区差价如此悬殊有所留意，是很可以理解的。至于傅立叶把他的思想成果，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(他自己称作“文明制度”)的批判，和对未来社会(他把自己理想的社会称作“和谐社会”)的种种玄想，都归之于一次偶然的“发现”，那就荒诞了，正象把牛顿之发现万有引力真的归因于他偶然见到苹果落地一样，这是把偶然性神秘化了。偶然的事情，总有必然的根据；必然的趋势，又总是通过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傅立叶尽管是一位大思想家，他对这一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哲理，却并不了然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对自己的“发现”是夸大其词的。

傅立叶的生平，不象某些伟大人物那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。但他由一个平凡的店员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，也自有他独特的发展过程。

公元 1772 年 4 月 7 日，傅立叶（全名是：弗朗斯

瓦-沙利-马利·傅立叶)出生于法国贝占桑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里。父亲老傅立叶没有什么学识,只懂得自己本行的生意经;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,文化程度也不高,只识得一些字,能够念念《圣经》。傅立叶的家庭教育是不值一提的,充其量就是父母给他灌输的这两本“经”——生意经和《圣经》。

求学时代的傅立叶,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。九岁的时候,老傅立叶去世,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,生活还是过得蛮富裕,因此,早年丧父,对傅立叶的一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傅立叶按部就班地在贝占桑从小学上到中学。在这期间,法国是处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,贝占桑是法国外省的一个城市,革命的思潮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反响。这儿的新兴资产阶级依然过着古老的宗法式的平庸生活,严格遵守封建的传统和宗教教义,唯一关心的是鼻子尖下面的一点点蝇头小利。年轻的傅立叶对于革命事业也很隔膜。

傅立叶中学毕业以后,按照他自己的意愿,想去首都巴黎继续升学,但是母亲不答应。母亲供他上学,只是让他学一点必要的知识,好继承父业。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,这时还不懂做生意,经父亲的友人的指点,母亲叫他到里昂(法国的工商业中心之一)一家钱庄里

学习经商,有了本领,就可以自己开业。傅立叶只好秉承母亲的意志行事。

由贝占桑来到里昂,这是傅立叶走向独立生活的开始。里昂的花花世界,使他眼花缭乱,年轻人一开眼界,就想看看更大的世面。他没有去钱庄就业,就自作主张地跑到巴黎去。母亲大为震怒,要儿子立刻回里昂安分学习经商。要不是母亲的



青年时代的傅立叶

催促,傅立叶真不想离开巴黎。回到里昂,他并没有遵从母亲的嘱咐,在钱庄里安心待下去,他老是调换工作地点,一个时期在这儿当当售货员,一个时期又去那里做做会计或出纳,最后,他对推销员和经纪人的工作发生了兴趣,因为这些工作可以到处走动。从1789年离开贝占桑,1793年又转回故乡,在这四、五年期间,他跑遍了巴黎、马赛、里昂、波尔多等法国大城市,还去过德国、荷兰等地。傅立叶的眼界确实大大开阔了。如果

傅立叶在中学毕业后果真继续升学,即使是去巴黎,也不一定有他在这个“社会大学”里获得更多的见识。

傅立叶是一个好学的人。他到处走动,也是为了学习。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就是在这期间养成的。他处处留心,事事注意,而且听了不算,总要亲眼去看一看。他为了弥补没上过大学对书本知识不足的缺陷,就抓紧自修。店员的劳动是很辛苦的,白天为老板售货,晚上要算帐,只能在深夜里读一点书。古典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,当代的伏尔泰、卢梭的著作,就是这样忙中偷闲地读的。因为无人指导,加之店员生活环境不安定,学习的时间很零碎,他读的书很不系统,只能碰到什么读什么。好在他的兴趣广泛,不管什么书,他读起来都津津有味。他既读过哲学书和文艺作品,也看了不少天文学、解剖学等自然科学著作。报纸和杂志更是他每天少不了的功课。丰富的多种多样的知识,使他观察事物、分析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。

1793年,他回到贝占桑。按照母亲的安排和原定的计划,这时他可以自己开业了。可是,他选择的时机是大不合宜的。这个年头,正是法国革命处于风暴的日子里,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酿成了国内战争。正当傅立叶在里昂准备就绪,打算开张的时候,吉伦特派在里昂发动了政变,雅各宾党人调集了军

队扑灭里昂暴乱，里昂陷入战火中。傅立叶经营的是法属殖民地的商品贸易，最大宗的商品是北非的棉花，这个东西正是军用物资，军队把它征用了。傅立叶一下子破了产，更倒霉的是，雅各宾党人误以为他和吉伦特派有什么瓜葛，把他逮捕了。还好，不久问题就澄清了，但强征他服兵役，直到 1796 年才允许他退伍。这一连串的个人不幸，对于傅立叶以后的思想很有影响。尽管傅立叶对现实社会作了种种尖锐的批判，但他始终仇视革命，坚决拒绝采取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。这一点留待后面去说。

傅立叶破了产，独立经商的本钱没有了，只好重操旧业，还是给别的商号当店员。这后一段的店员生活和前一段一样，他还是时常调换工作地点，到处走动，一有闲空，就抓紧自修。1798 年或 1799 年在巴黎费佛里叶餐厅吃了一只昂价的苹果，就是这个时期的事。傅立叶对这只苹果的事之所以如此津津乐道，看来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因为这时他已经商多年，阅历更深，资本主义商业的黑幕和弊端，他是体会得更多了；也许过去对这个问题，虽有大量的接触，有丰富的感性认识，但还是不系统的，而在遇到这只“闻名”的苹果时，他的认识已经起了质变，进入理性认识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他对资本主义商业已经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、完

整的见地了。

傅立叶对自己的“发现”是很自诩[xǔ 许]的，尽管整个说来，他是一个朴素谦虚的人。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“发现”公之于世。可是，一个平凡的店员有什么机会向社会表达意见呢？他想到应该自己办一张报纸，他毫不迟疑地向政府提出了申请。这时法国已是拿破仑在执政，拿破仑政府为了箝制舆论，对已发行的报刊还正在大加整肃，一个没来历的人要办新报更是通不过的。傅立叶没有办法，就开始写文章向报刊投稿，并不时给达官显爵上书，表示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改造社会的意见。这条道路也不是顺利的：投稿什九是被退回了，他的上书更是如石沉大海。但是，傅立叶并不灰心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写，并加紧研究他的“发现”。

1803年，他的一篇题为《论全世界和谐》的文章，终于在《里昂公报》上刊登出来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“发现”的尝试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表露了对拿破仑的幻想，希望拿破仑来执行他的在全世界实现“和谐”的方案。不久，他又直接给这个最高统治者上书，表达了同样的愿望。哪知道，这件事给他自己惹下麻烦，里昂警察当局对这个不逊的小店员注意起来了。上书非但毫无效果，在报刊上发表一点小文章的机会

也被剥夺了，因为警察当局知照当地报刊不准登载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的文章。傅立叶只好另找出路， he 于是更加专心致志地来研究他的“发现”，决心写一部大部头的著作，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体系。1808 年，一部题为《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》的书终于写好了，傅立叶自己花钱印了二千册，可是无人问津。要社会承认一个平凡店员的作品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这比著书立说本身更为困难。1811 年，傅立叶又以同样的主题写了一本《论情欲力学》的书，但因手头拮据，无法付印。后来，虽然还是设法印出来了，仍然销不出去。

1812 年，傅立叶的生活发生了一个转折。这一年，他的母亲去世。儿子多年在外的作为，母亲很不以为然，特别是听说儿子当了文人，更为伤心，担心儿子把家产要败光了。可是，傅立叶是独生子，她又不忍心夺去他继承遗产的权利，就责成她的三个女儿来共同管理遗产，不让儿子直接沾手，每年由三个姊妹付给傅立叶九百法郎的生活费。傅立叶有了这笔数目虽不大，却是固定可靠的收入，他也就不一定再去为人作嫁。加之，拿破仑统治时期，由于受到英国海外的封锁，商业呈现一片萧条，经常调动工作，不象过去那么方便了。而且商业的种种黑幕，早已使他很讨厌。就这样，

傅立叶离开了他厕身多年的商界。

傅立叶的平凡店员的生活至此告一结束。这时的傅立叶已是四十岁的壮年了，但在社会上还是默默无闻。

三 时势造英雄

傅立叶离开商界以后，有一段时期专门潜心著书立说。

为了争取社会承认他的“发现”，鉴于以前写的几本书都受到冷遇，他就千方百计想打开销路。这位老练的店员，知道这和其他商品不同，必得另谋推销的门路。对此，几乎只要他想得出、办得到的，他都作了尝试：自己跑到首都巴黎去推销他的作品；亲自登门把书送给学者、名流、官员、记者们，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；给国内外有影响的报刊、学会写信，要求他们评论他的著作；甚至向美国驻巴黎的领事求助，请他介绍美国的有志之士，协助实现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案，如是等等。可是，这种种努力都是徒劳。社会对他的回答是令人难堪的沉默，纵有少许反应，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。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：有一位和傅立叶一样，后来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驰名，而当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已享

有盛誉的英国慈善家、工厂主欧文，在收到傅立叶的信件和赠书以后，通过他的秘书给傅立叶复了一封普通的应酬信，礼貌地对傅立叶著作所宣扬的崇高目的作了一番赞扬，此外则别无他言。这已经是反应中最好的了。再看看美国领事是如何答复的，复信里装的还是傅立叶寄去的原笺，上面加了一句批语：“使人不能不怀疑，送来的这本书是大脑病患的产物！”

傅立叶对诸如此类的反响，心里会是什么滋味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傅立叶在白忙了一阵子之后，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门路，只得回到贝占桑继续他的研究和著述。

这样艰苦而平淡的生活又度过了近十个年头。

直到十九世纪进入二十年代，傅立叶才赢得几个有数的同情者。但他的思想影响很快地在扩大，同情和支持的人陆续增多，终于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派。在法国一些城市里，还建立了以宣传傅立叶思想为宗旨的小组。第一个傅立叶主义小组是在贝占桑建立的，倡导人是两个最早的傅立叶信徒，一个是贝占桑的官员尤斯特·缪隆，一个是女公民克拉莉斯·薇古尔。他们对傅立叶的支持最为宝贵，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傅立叶，使他安心著述，写好了作品立即出资付印；而且在精神上给傅立叶以鼓励，增强了傅立叶对自己理想和事业的信心。傅立叶的一个最得力的信徒是大学生

孔西德朗，他后来在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中也颇负盛名，他是傅立叶主义的继承人，傅立叶思想的阐释者和传播者。

傅立叶何以能由默默无闻、到处碰壁的处境一变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，甚至被一批信徒拥戴为领袖的呢？是“时来运转”了吗？“时来运转”之说，当然是唯心的胡说，如果把它理解为时势造英雄，这倒是不错的。客观的“时势”，社会矛盾的“运动”，促使人们注意到傅立叶的思想和主张，因而一下子把傅立叶推到历史的前台来了。

在傅立叶生活的时代，正是法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。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，不仅直接推倒了法国专制王朝，而且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。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比法国早的英国，也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产业革命，大规模的机器工业的出现，引起了社会极大的震荡，这个变革，法国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也相继发生了。尽管在这些风暴的年代里，作为店员的傅立叶还刚刚入世不久，对革命还懵懵〔měng 猛〕懂懂，但是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所展现的一幅令人失望的社会图画，傅立叶却是最早的觉察者之一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傅立叶的“发现”确是值得自豪的，他能够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在法国建立

的时候，就声言这个制度存在着不可救药的弊端，必须以“和谐制度”来代替这个“文明制度”，这是需要多么敏锐的观察力，多么大的胆识！傅立叶不愧是他那个时代的先驱，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大思想家。当然，毕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未成熟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，思想家的理论也只能是不成熟的；由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，思想家的方案也只能是空想的。关于傅立叶思想的概貌，我们在下一节再去说它。

且说十九世纪进入二十年代左右，何以傅立叶思想就能广为传播？简单来说，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灾难，到二十年代时已是更为深重了。如果说，早先还只有少许先驱者觉察到，这时，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。

拿法国最广大的阶层——农民来说。在革命胜利的初期，农民刚刚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，分得一小块土地，还算保持一个“小康”局面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二十年代左右，贫困破产的农民已比比皆是。小农身受几重盘剥：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竞争和排挤；高利贷者的压榨；包买商的勒索，还要加上政府的苛捐杂税。试问，

农民怎能不贫困破产呢！？

雇佣工人的处境更为悲惨。在拿破仑统治时期，由于战争频仍，物价上涨，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。机器工业出现以后，资本家乐于雇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，工资水准更被压低了。工作日则有增无减，每日工作十五小时，这是普遍现象。他们挤在潮湿的地下室，或者住在简陋的棚房里；饮食恶劣不堪，肉食根本谈不到，有时连马铃薯（这是他们的主食）也填不饱。由于缺少营养，毫无卫生设备，疫病流行。在业工人处境如此，失业者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。在革命初期，街头上的流浪汉、乞丐曾有所减少，这时又充斥街衢。小手工业者以前辛劳一天，勉强还可以过活，现在他们即使夜以继日、加班加点，也竞争不过大机器生产，最后这些小手工业作坊还是落得关门大吉。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这时还没有起码的阶级觉悟，他们总是迁怒于机器，有时行帮之间争夺生意，于是常常发生捣毁机器和工人械斗的事件。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反抗和挣扎活动，采取了残酷的镇压，在街头枪杀无辜人民的血腥事件层出不穷。劳动群众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活地狱中，他们对于傅立叶小组宣传的改造社会方案，自然比资本家强迫他们聆听的基督福音要入耳得多。